

◆白城英烈

施 介

(四)

●杨学程

延河滋润添斗志。

两三天以后，他们被分配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校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一元钱津贴费，一律平等。伙食很简单，每天两餐小米饭和粥，有时是窝窝头，副食一般是自己种的蔬菜。上课时，没有固定的教室和课桌，笔和纸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尽管条件艰苦，但“抗大人”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抗大的学习是讲实效的，一个课题、一篇讲稿，往往学了又讲、讲了又学，反复讨论，而且理论联系实际，政治课请著名学者来讲，使施介他们第一次较系统地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拓宽了思想认识，提高了思想境界，找到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军事课主要是抗日游击战争和一般军事常识，讲课的都是经过长征的有经验的干部。他们不搞纸上谈兵，采用启发式和研究式方法，结合实战进行演习，始终把教学与抗战、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学员很快掌握了军事本领。最令施介不能忘怀的，是有一次亲耳聆听毛主席作报告。毛主席对抗日战争形势的分析必须打长期持久战的科学理论，精辟

严密，听后使人心明眼亮。报告对敌人的辛辣讽刺入木三分，对一些问题的比喻形象生动、风趣幽默，给施介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受益匪浅。

1938年6月，施介到抗大不久，遇到了云南老乡朱家璧。朱曾任滇军靖卫团二连连长、云南讲武堂第五军官分校军事大队区队长。朱在滇军任职期间，追求进步，向往革命。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共同的理想追求，使二人经常在一起谈心。1939年初，朱家璧施介等人经研究后，由施介执笔，写了一份《我们对于将来回云南及滇军中工作意见的报告》，送给中组部。党中央接纳了这个意见，考虑到施介在云南太红，朱已有很好的社会基础，遂于1940年10月，朱家璧回了云南。

1939年初，施介结束了抗大的学习生活，被调到中央组织部总务处当处长，继而被选送入延安马列学院深造。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施介较全面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攻读了逻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运动史、苏共党史教材等课程，比较全面地提高了理论水

平。1940年，施介调任陕北公学教育处副处长。他兢兢业业钻研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培养革命干部的工作上。1941年他调任延安大学党总支书记，担当起全校1000多名师生政治思想工作的重任。整风运动开始以后，他负责该校的整风工作。在工作中，他牢牢把握党中央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并结合实际，力求使之具体化。他注重端正学风，通过深入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使全校师生特别是党员干部大大转变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进一步掌握马列主义普遍原理，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和无产阶级世界观。与此同时，更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使他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扼杀陕甘宁边区，对其进行残酷的经济封锁，切断了边区的供给和贸易渠道，使边区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施介积极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组织领导了延安大学全校师生的大生产运动，他带头参加劳动，和师生一起开荒，种菜、养猪、纺纱、织毛衣，靠双手改善了生活条件，解决了学习用具，保证了教学秩序的正常进行。

(一百零四)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B 白城记忆

●张朝元

中国人有喝开水的习惯。可是你知道吗，大家随手可得的开水，对古人来说却是奢侈品。

木炭在古时是烧火做饭的最佳燃料。但这不是每个人都用得起的。因为其价格特别昂贵，一般只有皇宫、官府及富贵人家才用得起。

自古宫廷和政府部门都有供炭制度保障。唐朝的“木炭使”、元朝的“柴炭局”、明朝的“惜薪司”、清朝的“柴炭处”等，均下辖柴炭厂、山林及专属的樵夫，负责为宫廷和政府部门采办燃料、制作木炭。而普通老百姓，绝对没有这样的待遇，要想用木炭来烧火做饭，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煤进入日常生活，始见于北宋的东京汴梁，当时称为“石炭”。那个时期的煤由政府实施管控统一售卖。比如，宋徽宗时，“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朝廷大获其利。这种专卖政策，往往导致煤价高昂，民众无法购煤用于生活。

木炭价格昂贵，煤炭又在政府的管控当中。于是乎，老百姓想要烧开水便成了一种奢望。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冬天，开封城“民间乏炭，其价甚贵，每秤可及二百文”（十五斤为一秤。可供参考的一个物价标准：大中祥符元年，北宋襄、许、荆南、夔、峡等地的麦子是12文一斗，大米是30文一斗）。眼见民众实在冬天熬不下去了，政府才将自己控制的木炭拿出来用最低价投放到市场上，结果民众蜂拥抢购，发生踩踏致死的惨事。

既然普通民众烧不起炭，煤也买不到，那只能烧秸秆和杂草这些“薪柴”了。遗憾的是，薪柴虽然是很低端的烧火燃料，但缺少柴薪却是古人的生活常态。比如，唐武宗时期，日本僧人圆仁来华，他见到山东一带普通百姓，因为燃料匮乏，“不曾煮羹吃，长年惟吃冷菜”，即使来了尊贵的客人，“便与空饼、冷菜”，作为招待的佳肴。这些底层人，热饭热菜都吃不上，自然别提烧开水来喝了。这也是为何缺柴少薪成为历代文人哀叹民生之艰主题的重要缘故。唐代诗人孟郊在《苦寒吟》中哀叹“敲石不得火，壮阳守正阳”；北宋诗人赵扩买不起柴，只好“毁车充薪”，把家里的车拆散生火来做饭；南宋诗人韩偓，“家贫无人去拾柴”，只好在寒冬里咬紧牙关发抖；元曲《朝天子·客况》里，穷人家柴薪不够，只能听凭冷雨寒风摧折……

宋元时期，情况稍微有些好转，这个时候出现了独立运营的茶肆、茶楼、茶坊，喝茶的风气深入底层社会。但普通人还是承担不起每日烧开水煮茶的燃料成本，他们只能在特别需要的情况下，从茶贩子手中买些茶水来喝。

到了清代，“戒饮凉水以防坏腹”的中土风俗，仍只存在于上层社会，多数底层民众继续喝凉水。当然，如果水太脏，古人也会做一些有限的处理，让生水稍微干净些……

当然，同一时期的欧洲情况并没有比我国更好。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比欧洲大型传染病肆虐带来的困扰要少，就是因为中国的饮茶文化和粪便处理比欧洲同时期更好，更注重卫生。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加强了喝开水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宣传和推广，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一再号召“要反复教育群众喝开水和消毒过的水，不喝生水”；各种官方编纂的《农村卫生员课本》也一致要求卫生员应当积极宣传喝开水的好处，带动群众养成喝开水的好习惯，至此，热开水才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廉 官 知 俭

●许万福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岁月留下了一个个崇俭戒奢的动人故事。本文选取了三位廉官的节俭故事，细细品读，值得沉思。

晏子是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他一生行俭，对后世影响很大。有一次，晏子正准备吃饭，齐景公的使者突然到来，晏子并未另外添加饭菜，只是一分为二，让使者与自己共餐，结果两人都没吃饱，使者遂将此事禀告给了齐景公。齐景公惊讶道：“作为宰相之家，竟如此贫寒，我还不不知，这是我的过错了。”于是，他派人送千金给晏子，让他供养宾客。晏子却拒不接受，齐景公多次相送，最终晏子辞谢道：“我家不贫穷啊，我将您之前的赏赐用来照顾父母妻儿，延伸到朋友，并以此救济百姓，已经足够丰厚了，您再给我过多赏赐的话，我直接散发也不好，自己私藏起来更是错误，这都不

是智者的作为。”由此晏子表白心迹，“夫十总之布，一豆之食，足于中，免矣。”只要有衣穿，有饭吃，内心就很满足了，这样也可避免祸患啊。

“倔相公”王安石一贯视饮食为小事，粗茶淡饭，自得其乐。有一次，王安石儿媳家的亲戚萧公子前来拜见，王安石说请他吃饭，这位萧公子很是期待。谁知，王安石并没有用什么盛宴款待他，而是几枚胡饼，几块猪肉，随即主食一并送上。萧公子大失所望，觉得太过普通，难以下咽，只吃了胡饼的中间部分，还余有四边。王安石倒是吃得津津有味，见萧公子娇纵，王安石也不嫌弃他，将他剩下的胡饼拿来吃了，萧公子感佩王安石的节俭之风，不禁惭愧退下。王安石身为宰相，不以山珍海味为美，是因他对个人享受不感兴趣，一心都在推动国家富民强的改革大业上。

与以上两位相比，北宋宰相吕蒙正对于节俭则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朱熹的这首《偶成》，在秋日读来更有感触。你是否知道，古人为何把时间称作“光阴”，又为何用长度单位“寸”来衡量时间？

光阴一词的出现，与古代的计时工具有关。在清代以前，中国没有钟表，要想计时很不容易。当然，这并不代表古时没有计时工具——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通过对一些自然现象的不断观察，逐渐掌握了日升日落、星辰出没、月亮圆缺等周期性的变化规律，并以此为契机发明了各式各样的计时工具。“日晷”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日晷，就是人类根据日影位置的变化来测量时间的一种工具。日晷由底座、晷面、指针组成。底座与地面平行，晷面与赤道平行，指针与地轴平行。指针一般为铜质，垂直穿过晷面。晷面呈圆盘形，石质，正反两面都刻有12个时辰。

当太阳光照在日晷上时，晷针的投影就会投向晷面，指在哪个位置，便认定为相应的时刻。从早到晚，太阳由东向西移动，每走一步，指针影子也紧随其后产生相应变化。太阳是“光”，影子为“阴”，流逝的时间体现为光的阴影变化，“光阴”这个词就由此而来。

我们现在用时、分、秒来度量时间，古人为何用“寸”来度量光阴？《大戴礼记·主言》中记载：“布指知寸，布手知尺。”郑玄注解《礼记·投壶》时说：“谓四指曰扶，一指案寸。”可见，寸是一指宽的长度。而晷针影子在盘上移动一寸所花的时间，就被称为一寸光阴，即“寸阴”。

古人用寸来描述光阴，自有道理。一方面，寸比尺小，又引申为非常微小、简短之义，成语寸寸必争、寸步难移中的寸均为此义。用寸来衡量时间，更显时间之珍贵易逝。另一方面，寸比分、厘、毫等量词更容易使用——伸出手指就能衡量，光阴由此变得可以触摸，别有一番意趣。

在对天地万物的观察中，在四时的流转往来里，古人逐渐认识到，时光流逝从来无情，不曾等人。首先将“寸阴”与“寸金”连在一起，劝喻人们珍惜点滴时光的，是《淮南子·原道训》：“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璧是古代用于祭祀的玉环，虽价值连城，但时间却比璧玉更为宝贵。唐末诗人王贞白，早年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读书求学时，曾写下《白鹿洞二首》，其中一首中有“读书不觉春已深，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句子，这可能是“一寸光阴”的最早出处了。

除“寸阴”外，古人还常用刹那、瞬间、弹指、须臾、白驹过隙、时光如梭等词语来形容时间，无不与“寸阴”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成语白驹过隙，时光飘过缝隙，所谓缝隙也就一指之宽，与“寸”何其类似。从这些词语中可看出，古人眼中，时间总是短暂而飞速流逝，比金子更宝贵，以至于他们常常发出时不我待、抓住时光的呼喊。所以，“闻鸡起舞”“悬梁刺股”这种争分夺秒的故事，以及“早起三朝当一日”这种朝乾夕惕的行为，才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写照。而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深刻地懂得时间的意义，才在光阴滴滴里得到了长存的馈赠。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寸光阴不可轻。

另有一番心路历程。吕蒙正宽宏大量、正道自律，敢于直谏、善于识人。史书记载，有一个官员想巴结吕蒙正，送给他一面古镜，并声称有很神奇的功效，能照出二百里远，吕蒙正拒绝了，他笑道：“我的脸不过碟子那么大，要能照二百里的镜子干什么呢？”别人听了后都对他很佩服。

吕蒙正小时候家中很贫穷，曾拾别人不要的瓜吃，后来任宰相后，他还建了一座“饕餮亭”以示纪念。吕蒙正后来在生活上也讲究起来，变得更为奢侈了。他最喜欢喝鸡舌汤，有一天，他闲逛到自家花园，见墙角有一土丘，便好奇地问那是什么，旁边的人回答，这是为相公准备鸡舌汤所杀的鸡毛堆。吕蒙正很惊讶，我食鸡有这么多吗？旁人表示，一只鸡才一条舌，一碗汤又有多少条呢？吕蒙正沉默不语，深感懊悔，从此再不喝鸡舌汤了。吕蒙正知过能改，注重家风，其后辈多有名人，他本人也被誉为一代贤相。

纵观以上三位廉官，晏婴在节俭中得到满足，王安石不以节俭为节俭，而吕蒙正知奢即返，回归节俭，三者因际遇和认知而各有侧重，就像三面镜鉴，可供人们对照反省。爱惜粮食、杜绝浪费，并不因生活条件好转而改变，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对于当前仍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不仅是与一粥一饭有关，更与保持锐意进取精神，培育节俭清正品格紧密相连。

展示红山文化最新考古成果

● 闫白



碧玉C形龙

“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红山文化是距今约6500—5000年前中国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本次展览共展出玉质礼器、红陶祭器、人像雕塑等珍贵文物160余件，结合考古现场图片和建筑过程复原，集中展示了红山文化历次重要发现和最新考古成果。

1930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到赤峰英金河流域进行史前考古调查，揭开了辽西地区田野考古的序幕。1954年，学者尹达首次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强调红山文化对于研究长城以北和以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983年，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群开始正式考古发掘，成为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牛河梁遗址群分布范围广达50平方千米，发现有祭坛、女神庙、积石家、大型祭祀平台等遗存，这一“坛庙家”组合见于红山文化的其他遗址。积石家内有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边缘墓之分，显示等级制度已经确立。出土遗物以女性塑像为主，附以动物塑像和陶质祭器，最为著名的女神头像就在这里发现。此次展览中有多件女神庙出土的泥塑人像残件，其中耳朵残块大小约为真人耳朵尺寸的两倍，人手残件与真人手掌大小相当。同时展出的还有女神庙内发现的动物塑像残件，主要有禽类和兽类，禽类残件具有鹰的特征，兽类残件则具有熊的特征。

红山文化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和时代风格的玉器。这些玉器的造型胜过纹饰，鬼斧神工，多为墓主人生前使用，死后用来随葬，成为墓主人社会等级、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标志着当时红山已形成了具有唯一性的玉礼制系统。

最有代表性的玉器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的碧玉C形龙。这是已知红山文化玉龙中形体最大的一件，整器由墨绿色岫岩玉雕琢而成，吻部前伸上扬，梭形细目，鬃鬃飘举，卷尾有力，躯体卷曲若钩。虽无角、无肢、无爪，却极富动感。

这次还展出了猪龙、勾云形器等多件红山文化的玉器。勾云形器是红山文化晚期的代表玉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27号墓出土。玉为深绿色，有黄色瑕斑及开片。器体呈扁平长条形，有正、背面之分，两面都有雕纹，正面雕纹较深。可以看出，这件玉器不是完全写实性的，而是通过想象和夸张，将几类动物的特征集于一身，采用拟物与抽象相结合的手法，以平面减地打磨的工艺，表现出红山文化先民高超的玉器制作水平。

半拉山墓地的新考古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内涵。考古人员发掘墓葬78座，祭祀坑29个，祭坛一座，同样出土了大量的玉猪龙、玉璧等玉器，还有象征军权或神权的石钺及柄端的兽头柄饰。祭祀坑和祭坛则出土了多件陶质、石质人头像。展览展出的—件石雕人头像采用了圆雕手法，面部轮廓清晰，颧骨突出，柳叶形眼睛，头顶还有冠带装饰，风格写实，揭示出成熟的雕刻传统。

考古证明红山文化不仅传承了本地区前红山诸文化和相邻地区较早文化的诸多因素，而且与同时期的其他重要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展览通过红山文化出土文物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出土文物进行对比，深刻揭示了西辽河流域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要冲地位及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影响。



玉勾云形器